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传统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提 要: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为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对西部文化建设,对发扬丝绸之路的文化传统,增进我国同亚、非、欧洲国家的友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古今中外文献及多项考古成果证明丝绸之路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其后它成为一条以东西主干道为轴、南北支线延伸发展、羽裂状分布的经济文化交流带。从玉石东进到丝绸西输,这条通道为东西方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入挖掘史料,揭示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与影响所及,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提供有效借鉴,并将东西方交流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关键词: 丝绸之路;形成时间;东西交流;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5)06-0105-05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和公开支持。无论从亚太地区的安定,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是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强大、从我国西部大开发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世界反霸权运动的发展和各国独立自主精神的伸张,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但仍然采取包围、限制发展的策略。它对日本极右势力军国主义行为的一再纵容便说明了这一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无形中打破了美日控制一些国家、限制中国发展的阴谋,形成亚、欧、非很多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亚、西亚一些国家在宗教方面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主要是个别宗教极端主义者操纵的结果。我们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友好关系,使当日的丝绸之路为亚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发挥更大的作用。亚洲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抱着个人野心挑动战乱的行为,包括一直在我国新疆强生事端的“东突”分子之类的捣乱也便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会自行消解。

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多年,投入了大量财力,西部各省区虽然各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同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在进一步扩大。这原因在于东南沿海地区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对外开放的门户,而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则相距开

放前沿地带较远,交通不便,进和出的成本都很高,不仅国外企业家,就是国内一些大企业,也因其中转成本高、运行不便等各方面的原因而却步。一旦向西的门户打开,这些原来最为偏僻的省区一下变为了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只要发挥特长,因地制宜,就会与相邻国家做到双赢,西部大开发的效力也就大大提高了。

所以,“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对当前和今后经济、政治的发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主要从历史上丝绸之路开始的时间、存在的状况(主干道、支线、连接点城市的作用、东西延伸)、在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今天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这条东西通道在商周以前已经产生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①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Seidenstrassen”,也即英文的“Silk Road”,汉文译作“丝绸之路”。李希霍芬所划定的时间范围,即张骞通西域至东汉顺帝永建二年焉耆等国不再附汉,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朗讨焉耆、尉犁、危须三国止。所以,学者们都以为丝绸之路是从张骞通西域之后才有的,实际上这条通道在张骞通西域之前

很早就已形成。《山海经·北山经》中有“敦薨之山”，言“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海。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敦薨之水”当即今发源于青海疏勒南山的党河或其东的疏勒河。古人或以发源于疏勒南山、托来南山之间的大通河为黄河正源，故言其发源处为河源。“敦薨”即“敦煌”，是“吐火罗”的不同音译。“渤海”即罗布泊，上古之时是一个大泽²⁾。由此看，敦煌一带很早就为中原人所知，月氏人由这条路进入华夏也是很早的事。

《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之时。书中写周穆王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口组三百纯”，反映了丝绸西传的事实。其中关于西方珠泽玉山的记述反映了西面的昆仑之玉等很早就进入中原一带的历史事实。清人陈逢衡、郝懿行，近人孙诒让、丁谦、刘师培、顾实、岑仲勉等都做过十分深入的专门研究。日本学者小川涿石有《穆天子传地名考》。顾实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书之外，还有《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西征年历》《西征地图》《读穆传十论》，对周穆王西征所经地名做过极细致的研究。根据他研究的结果，书中所写穆王自镐京经甘肃、青海，越葱岭至波斯³⁾。赵俪生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有《〈穆天子传〉中一些部落的方位考实》，其中说：“穆天子自从离开帕米尔地区，不久就到了西王母之邦。”⁴⁾这一点上其结论与顾实先生相近，唯具体路线及所到最远之处在哪里，看法不同。而且，顾、赵两家及此前很多学者都认为《穆天子传》具有史料价值，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西周时代历史与人们对西部部族与地理的理解。顾实认为中华民族同西部中亚带的政治、文化的交流至迟在西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可以看出，《穆天子传》所记述的周穆王西行路线与丝绸之路基本是一致的。

我们从外国文献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流从先秦时已经发生。学者们以为《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所说当时有来自“西尼姆国(Sinim)”之人，“西尼姆国”即以后希腊、罗马著作中对中国之称“秦尼国”的转音(“西”读为尖音，音近Si)⁵⁾。更确凿的证据是，苏联考古学家曾在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省冰冻结实的墓葬中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特别精致”，“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素底间”。苏联考古学家根据有关材料断定其为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⁶⁾。又美国《全国地理》杂志1980年3月号报道德国考古学家在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一个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墓中发现中国丝绸的残片⁷⁾。近代德国学者雅各比教授查得公元前300余年，印度

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一大臣所著《考铁利亚》一书中有支那产丝，其丝货贩至印度之语⁸⁾。此书写成时间相当于中国战国末期，标志着这个事实的时间下限。当然这不排除海上丝绸之路运去的可能性，但由中亚传去的可能性也极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桑蚕本是桑树的害虫，我们的先民变害为宝，专门养蚕缫丝，用丝织成绢、帛、绸缎。丝绸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传说黄帝元妃嫫祖始养蚕，“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路史·后纪五》)。又传“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绎史》卷五引《黄帝内经》)。传说也往往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我们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些传说确实反映着一定的历史事实。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一个遗址中出土了半个蚕茧⁹⁾，距今4000余年。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实物距今4700年，时间最早，与传说的黄帝时代也接近。所发现的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等，绢片相当精致¹⁰⁾。由此可以肯定，中国在近5000年前已发明了养蚕缫丝，那么，中国的丝绸有可能在西周之时即传至西域，在春秋战国之时已形成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是完全可能的。

以上事实说明，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其形成是很早的，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就已产生，中国从三四千年以前已同中亚、西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和民族有了亲密往来，中间虽然出现过阻隔，但大部分时间中是畅通的。所以说，这条道路是一条历时很久的友谊路。

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重温几千年中的相互来往，互通有无、互相推进、共同发展、共同创造世界文明史的经历，以增进友谊，共谋发展，同时，也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今天个别国家想控制世界，一些暴力集团不断制造事端，影响亚洲发展，影响世界和平的情况下，尽可能创造相互沟通、共同发展、稳定亚洲及周边局势，促进世界和平。今天我们应继承并弘扬东西方在交流中共同发展的优良传统，为世界文明，为世界的安定与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二、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封闭的道路

(1)它有主干道，但也有北线、南线。《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北线经玉门关、夷吾、车师前国、高昌壁、焉耆、乌垒(汉代西域都护府)、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喀什)，越葱岭(今帕米尔)，经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西行至咸

海、里海以北达俄罗斯；南线经阳关、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扞弥（今于田）、于阗、莎车，越葱岭，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下游），南北两道合于木鹿城（今马里），再向西经和犊城（今里海东南达姆甘）、阿蛮（今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到达罗马各地。另外还有支线。出敦煌向北，经天山北麓至伊犁河流域再向西北，可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也可由蒙古草原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这些都是历史的存在，我们不能强调它是一条路而忽视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2)在整个丝绸之路上都有一些大小不等的交通枢纽或带有中转性质的城市，进行部分的物资流通、商贾、使臣、僧侣、艺人也借以短暂休整，东西方的人都可能作较长时间停留或永久性居住。长安以西中国境内如上邽、陇西、姑臧、张掖、酒泉、敦煌及北线、南线路上一些人口较多的城镇，都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地点，有的甚至是贸易重镇与文化艺术的重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国外部分也同样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商贸与文化交流的扩散点。这就是说，丝绸之路并不只是在一条线的起、止两个点上起着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的作用，而是对沿线各重要居民聚居的都市、城镇都起着经济文化等的交流、推动作用。

(3)丝绸之路上距离不等的分布着一些向南、向北延伸的交通要道，它们使丝绸之路上商贸、文化的交通向南北两面延伸。这方面，我们过去只注意到国外部分，如向南直通印度，向北至今俄罗斯等。但对于国内部分的关注度不够，比如丝绸之路同蜀道的交通，不但陕西境内有沿骆谷、褒斜道通于蜀，甘肃境内也有由天水向南，过祁山、入长道，由文县以南入蜀之道，至今留有处处栈道痕迹。今天陇南的西和、礼县、成县、徽县、两当、宕昌、武都、文县、康县等古代皆归于蜀。正如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俗史》之“先秦卷”（晁福林等著）所指出：“在春秋战国时期，蚕桑的种植并不以南方为主，而是于北方地区广泛种植和养育。”《诗经·豳风·七月》是周人歌唱其建国以前很早的公刘时代一年中农业生产与生活的诗^[1]，诗中“爰求柔桑”“蚕月条桑”“猗彼女桑”，则在商代初年今陕西彬县一带与甘肃陇东（大体泾河、马莲河流域）已开始养蚕缫丝。实际上至汉代丝绸生产仍以北方为主，如汉乐府《陌上桑》所唱，“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其中还有“青丝为笼系”之句。这“秦氏”之称很可能同秦地有些关系。即使按崔豹《古今注》所说“秦氏，邯郸人”，总也是在北方。后来由于气候变化，北方种桑养蚕减

少，而集中于蜀。蜀地的织锦工艺发展、繁荣较江南一带早得多，唐代以前闻名天下，丝绸之路上由长安等地运往西域以至今欧洲之地的丝绸，大多产于蜀地。看到这些，才能看到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巨大影响，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现实意义。

(4)丝绸之路东面的起点，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起于长安（即今西安），但也有有的学者认为起于开封，还有的认为起于连云港，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东面一直延伸至日本。笔者认为东端的起点是长安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长安在很长时间内，尤其在向西道路通畅的汉唐两朝的国都皆在长安，先秦之时周王朝都城也在这里。作为都城，不仅是政治的中心，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对丝绸之路的发展状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并不是说丝绸之路形成的经济、文化交流到此为止，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宗教的传播与影响，向东一直到开封甚至连云港也是事实。但丝绸之路的东面起点是长安。至于日本，中国文化的东传，无论是传播机制、形式，还是内容方面，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归在一起。即使这样，也正如历史学家方豪所言：“丝路实可称为旧世界最长交通大动脉，为大陆国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联络线。”^[2]

由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横贯陕、甘、新的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线，而是由这个主干道为轴形成一个羽裂状的面，两头是扫帚状的延伸。所以它的东端不仅仅影响到我国西北、西部的经济与文化，它同海上丝绸之路的结合影响到全国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从西端来说，也不仅仅同古代的某一国家或地区联系，而是同中亚、西亚及其以西、以北、以南的一些国家、地区都有联系。

三、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推动了亚欧经济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与发展

人们知道，中华民族在史前时代就很重视玉，佩玉成了身份与修养的标志，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赠送各种玉制品成了建立友谊的象征。我国在距今6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即发现制作精美的玉龙、玉玦等各种玉佩，南方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各种玉器其制作更为精湛。古代在中原、西北一带也产玉，但以昆仑玉最为珍贵。丝绸之路上玉的东进与丝绸的西行都标志着世界文明的演进。《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在“流沙”“羸母之山”之后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联系前面所说《山海经》中关于“敦薨之山”的

记载看,中原一带对西部近西域之地的了解,也同玉的传播有关。今安西城西北有玉石山。2014年7月,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启动仪式上笔者谈了这个问题。有关人员果然在这一带发现了玉矿,命名为“敦煌玉”,开采后制成精美的工艺品,在2015年6月17日西北师范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玉石文化高峰论坛”上展出,受到来自北京、上海等地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

《穆天子传》中写到周天子升昆仑之丘,舍于珠泽,“珠泽之人乃献白玉石”。又写到“升于春山之上”,“天子于是得玉荣枝斯之英”^⑧。又写到了西部黑水附近的“群玉之山”,“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并且留邢侯“待攻玉者”。“攻玉者”即磨砺玉、加工玉的工匠。因原料带起来太重,待加工后运于长安。书中又写到其北亦产玉,当地人向周天子献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也,不受其牢”(按:“牢”,这里指牛羊),意思就是只要玉。西王母所在之地有瑶池,“瑶池”由其名称看亦为采玉矿之地。归途中周天子还将玉器赐给有的部族首领,正反映了玉器东传的实际。分布于甘肃永靖、武威、广河、兰州、秦安及宁夏和青海一些地方的齐家文化,距今3000多年至4000年,发现遗址300多处,其中多有玉器,且主要是祁连玉。近年又在新疆发现一些近于齐家文化的遗址。这些都印证了早期文献中的记述。所以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是玉石之路,实际上也就是“玉帛之路”。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对宗教、音乐以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比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对中国的哲学、思维方式、文学艺术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佛教传入后一开始便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以及中国历代高僧的智慧,佛教也已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古代的日本等东亚一些国家是从中国取经,而不是像唐三藏一样去“西天取经”。新疆最早流行的也是佛教,9世纪回鹘人建立喀喇汗朝才大力推广伊斯兰教,以后全部信仰伊斯兰教。汉唐以后中原地带在音乐、舞蹈上汲取了不少西域的东西。生活方式上,如魏晋以前古人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有几以放置杯盘书册,唐代才开始有床、榻等坐卧具,渐变为椅、凳。今日所用之桌,也是唐代以后才传入中国。这些变化都是同丝绸之路有关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文化传统未中断的国家。中华民族一直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吸

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民族重礼仪、重操守、敬天尊亲、珍重友谊,自古闻名于世。生活年代大体相当于汉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的罗马学者白里内(Gaius Piny Elder,公元23—79年)所著《博物志》(Natural History)中由里海一带起向东历历加以叙述,关于中国境内说道:

赛里丝人即处此。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丝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而绝不求售也。

公元50年顷(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罗马著作家梅拉在关于中国的记载中说:

……赛里斯国即居二山之间。其人诚实,世界无比。善于经商,可以不面对面贸易,遗货于沙磧中^⑨。

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希腊人马塞里奴斯所著《史记》一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述:

向东有赛里斯国。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续不绝,成天然保障。赛里斯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行,广大富饶。……赛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气候温和,空气清洁,适卫生。天空不常见云,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⑩。

6世纪初成书的《洛阳伽蓝记》卷三“宣阳门外”一段中说: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

德国近代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歌德(1749—1832)读了中国明代小说《侠义风月传》的译本之后,在给同时代的德国另一杰出诗人和戏剧家席勒的信中对书中所反映的中国风俗极为赞赏,他说:

在他们那里一切比我们这时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

歌德以这部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了一个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多》。他又将中国《赵氏孤儿》的剧本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可见中华民族的勤劳、诚实、和善的民族特性,从上古至近代,都对西方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几千年来勤劳耕种、放牧、

狩猎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的先辈在两千多年中也与周边民族和睦相处,把我们的创造、我们的智慧和友谊送给他们,同时也吸收他们的优秀文化,甚至于在很难评判其优劣的情况下,出于交流、理解、尊敬对方、建立友谊的目的而采用他们的某些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等,这无论是在文化艺术还是起居服饰方面都有不少证据。

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和平交往、共赢共进的传统,建成由我国西部陆路交通为主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推动我国西部与中亚、西亚及欧洲一些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维护亚洲、欧洲、非洲的稳定,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甘肃、新疆、青海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沿。在我国对外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央在东南沿海经济得到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在政策上、资金上都给予大力支持,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同东南沿海的差距却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这些省区距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太远,大山广漠的阻隔和改善整体条件上的成本太大。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发挥所长,很大程度上减小了以上的困难,各项建设的投资效益会大大提高。同时,因为与相邻西部国家之间供其所需、销其所有,也自然会建成互利共赢的友好关系。

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是从全国经济发展以至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的,而西北、西南各省在经济发展中直接受益。我们作为处于丝绸之路黄金地带的学者一定要深入挖掘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认真总结丝绸之路发展中的经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为地方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起到一定的资谋参考的作用。

注 释:

①河中地区:此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

②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1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战国时期全图》。

③参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8月版,第146、148页。顾实又说:“更即此以推唐虞之西王母,亦当如是也。”见同书第146页。按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尧西见王母。”《易

林·明夷之萃》:“稷为尧使,西见王母。”顾实本此而言。另外,顾实先生还据《传》中西王母自歌“我惟帝女”一句,及《周易》中有关卦象说明,认为这个西王母为周穆王之女。如果这样,西王母是西周时代中原王朝为了同西部部族和好而去和亲的女子。

④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第296页。

⑤见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3册,第35页。

⑥C. N.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⑦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

⑧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6册,第9页。

⑨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见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⑩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对蚕丝织成的绢片有补充说明。见《考古》1980年第4期。

⑪《诗经·七月》诗中“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应指登当时的幽公即刘之堂。因诗中夏历、周历并用,说明由夏入商不久;诗中称年曰“岁”,是夏人习俗(《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写服饰尚黑,曰“载玄载黄”、《礼记·大传》“易服色”,孔颖达《疏》:“谓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均可证产生时间当商初周刘之时。

⑫见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3页。季羨林先生在《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中也说:“世界历史上有名丝绸之路,就是横亘西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⑬春山,顾实以为即葱岭,今帕米尔。《山海经·北山经》:“边春之山多葱。”郭璞注:“或作春山。”盖因一音之转而有“多葱”之说,汉以后书称作“葱岭”。又:引文“玉”字下郭璞注:“英,玉之精华也。”“荣”字之义同。

⑭以上两条转引自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7月第1版,第20页。

⑮转引自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7月第1版,第47页。

作者简介:赵逵夫(1942—);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文学遗产》编委,甘肃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甘肃省文化发展研究会顾问。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鲁雪峰